

# 空间、知识、权力<sup>①</sup>

## —— 福柯访谈录

□ 米歇尔·福柯 保罗·雷比诺

雷比诺：你在 *Herodote* 杂志与一些地理学者的面谈中提到自 18 世纪末叶起建筑变成政治性的（见《权力的空间化》一文），很明显地，在更早的时代中，它也是政治的，就如在罗马帝国吧。18 世纪为什么是特殊的？

福柯：我声明的形式实在很笨拙。我当然无意说建筑在更早的时期不是政治的，而只有在那之后才是。我的意思只是在 18 世纪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对应于社会统治目的和技术的功能，反映在建筑的发展上。我们开始看到某种形式的政治文献，讨论这社会秩序应如何 城市应如何 提出维持秩序的条件 提出应避免传染病、避免叛乱，允许正当以及道德的家庭生活等。在这些目标下，他们构想着城市应如何组织、公共基本建设应如何兴建？以及住宅应该怎么盖。我并不是说这种反应只在 18 世纪才有 但是在 18 世纪时，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很广泛而普遍的反省发生。假如我们打开当时的警察记录——那些讨论统治技术的文章——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和都市计划（urbanism 在其中

① Paul Rabinow (1982)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terview of Michel Foucault", *Skyline*, March, pp.16 - 20.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才是我想说的。

雷比诺 在古代 罗马或希腊 有什么差别呢？

福柯：讨论罗马时期时，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围绕着维特吾威（Vitruvius, Pollio）身上。维特吾威从 16 世纪起被再诠释，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 16 世纪——毫无疑问的中世纪亦然——许多对秩序的考虑是与维特吾威相同的；假如你把它们当作是反省（reflection）的话。这些讨论政治学、统治艺术、好的统治方式的文章通常并不会包括谈论城市与建筑组织的章节或分析。波丹（Jean Bodin）的《共和国》（*Republic*）（巴黎，1577）里并没有包括建筑角色的后续讨论 可是在 18 世纪的政治性论文中却随处可见。

雷比诺：你的意思是在当时只有技术与实践，却不存在话语（discourse）吗？

福柯：我并没有说在 18 世纪之前没有建筑的话语。我也无意说 18 世纪以前的建筑讨论缺乏政治的向度与意义。我希望指出的是 从 18 世纪起，所有将政治学当成人之统治艺术的讨论，都加入了一篇或一系列论城市规划、公共设施、卫生以及私人建筑的章节。这种章节在 16 世纪有关统治艺术的讨论中并不曾发现。此一改变可能不是建筑师对建筑的反省，反而，可以很清楚地 在从政者的反省中看到。

雷比诺：那么建筑理论本身不需要改变吗？

福柯：不错！并不需要建筑师在想法或技巧上的改变——虽然这仍有待验证——而是从政者的想法选择与他们加诸关心对象的注意方式的改变。建筑在 17、18 世纪变成了这个对象之一。

雷比诺：请告诉我们为什么。

福柯 嗯 我想这跟一些现象有关 比如 城市的问题 以及 17 世纪初期明确形成的看法：统治像法国这样的大国，最后应以

城市为模型来思考它的领土。城市再也不被当成一个特权地点，不再被当成田野、森林、道路范围中的一个例外。城市再也不是在共同法律之外的孤岛。反而，城市有许多它们自己造成的问题，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成为了统治理性的模型而施之于整个国家。

有许多治理领土的乌托邦和计划，是在国家好比一个较大的城市这个前提上发展出来的。首都好比城市中的主要广场，道路像城市中的街巷。当警察体系一如城市警察般紧密有效，而延伸到整个领土时，国家就可以被组织起来。起初，警察这个观念只被用在维护城市平静的条例上，但是到这时候，警察变成了统治整个疆土的理性典型。城市的模型变成了使用于全国之法令的依据。

警察这个观念，就是在当今的法国，也经常被误解。有人向法国人提到警察时，他只能想到穿制服、从事秘密任务的人。在17、18世纪，“警察”意指着一个统领理性的纲领。这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引导不同个体的法律体系，由之所有事务都被控制在自足的状态，而不需任何干涉。这是比较典型的法国式的警察化（*policing*）结果。由于某些缘故，英国人并未发展一个可相比较的系统，一方面主要是由于他们议会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有共同自律的传统，更不用提宗教体系了。我们几乎可以把拿破仑放在18世纪警察国家的旧组织（当然应以我们刚才讨论的意义来了解，而非我们今天的“警察国家”意义来了解）衰败，以及他们所发明之现代国家形成之际。总之，看来18、19世纪间出现了——在商业中比其他各领域都快——一种警察可以用来渗透、刺激、节制以及报告社会机制之绝大部分运作的看法，这个想法被放弃很久了。问题被翻转。我们再也不问：什么形式的统治

理性可以渗透人身体政治 (body politics) 而进到它最基本的元素之中？反而，我们问：统治应如何进行方为可能？亦即，什么是统治行动的限制原则，如何使整件事处在顺应统治理性、无需干预的最佳状态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的问题浮现出来。就我看来，在那一刻的问题是：当统治过多时，其实什么也没统治——即引出的结果与原来的期望大相径庭。当时的发现是——这也是 18 世纪末叶政治思想之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提出社会这个观念来。这就是说 统治不只是处理一个领土、区域和它的子民 而必须同时处理一个有自我法则、反应机制之复杂而独立的现实：它的调适以及可能的干扰。这个新现实就是社会。自此刻起，统治是操控社会，社会不能当成可被警察完全加以渗透的。我们必须斟酌社会是什么 而变成必须反省社会 反省它的特性、它的恒常与变动……

雷比诺：因此，也造成了空间重要性的改变。18 世纪时 存在着领土和统治领土上的人民等问题：他们可以选择像拉梅塔 (Alexandre Le Maitre) 的《红衣大主教》(La Métropolitaine) (1682)<sup>①</sup>——一个讨论如何建造都城的乌托邦论文——中的方式，或把城市当成领土及其治理的一个隐喻与象征。这些都是相当空间性的 但在拿破仑之后 社会已不必如此空间化……

福柯：不错！一方面不需要如此空间化，但与此同时，某些特定问题看起来却又空间化地兴起。都市空间有它本身的危险性——疾病 如欧洲在 1830—1880 年间的霍乱传染病；以及革命，

<sup>①</sup> *Métropolitaine*，法文东正教之大主教之意，与 *metropolitain*（大城市 大都会 有相同字根 *metropolitain* 有一个意思是大主教住的城市。

如同时期震撼全欧洲的一连串都市叛变。这些空间的问题，可能不是新问题，但却占有一个新的重要性。

其次，铁路是一个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新面相。这关系到建立一个不必然与传统公路对应的交通网路，但是它们却必须放在社会性质与历史中考量。此外，铁路造成了一些社会现象，作为它们的抵制，它们刺激了人口的转化。欧洲对铁路所造成的行为变迁有立即的敏感。到底什么事会随之发生呢？比如，柏杜 *Bordeaux* 和兰提丝 *Nantes* 的人可以方便地结婚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比如，德国人民跟法国人民可以方便地彼此认识，那又将如何呢？假如有铁路的话，那么战争不会发生吗？在法国有一种理论认为：铁路可提高人民间的熟悉，以及人类普适性的新形式，而使战争变成不可能。但是人们并没有预见到——虽然德国军事将领们已察觉到了，因为他们比法国军阀更聪明——相反的，铁路使战争变得更容易进行。第三个发展是后来出现的电气。

因此，在连结政治权力与领土空间或城市空间时，便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连结是全新的。

雷比诺：因此，历史更不属于建筑了。这些是空间的技术。

福柯：从 19 世纪起，空间最重要的问题已完全属于另一类。这并不是说建筑性质的问题被遗忘了。从我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来看——在疾病和政治问题中——建筑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这些问题反映在都市计划和工人住宅的设计上，都是在建筑领域内的反省。

雷比诺：但建筑本身，如美术学院 *the Ecole des Beauxart* 就属于完全不同的空间课题。

福柯：不错！随着新技术的诞生和新经济的运行，我们看到

了一种不再以领土都市化之警察国家为模型的想法，延伸到都市计划与建筑的局限之外。

雷比诺 随之 桥路学院 (E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

福柯：不错，桥路学院和它在法兰西政治理性中首要的重要性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建筑师 而是工程师和桥梁、道路、管线、铁路的建造者 以及技术员 (polytechnicians) (他们专职控制着法国铁路)——这些才是构想空间的人。

雷比诺：这个情况是否一直持续到今天，或是我们正目击一个空间技术专家间的转变？

福柯 我们可能看到某些转变 但我认为 迄今为止 我们仍然停留在领土的开发者和桥路学院等人身边。

雷比诺：因此，建筑师不必然是他们曾是或信以为是的空间主宰 (masters of space)。

福柯：不错。他们不是三个重要变数——领土、交通和速度——的技术员与工程师，这些变数都逃到了建筑师的范围之外。

雷比诺：不管过去或现代，你是否看到任何特别的建筑设计成为解放或抵制的力量？

福柯 我不认为可以说什么东西是‘解放’的秩序 而另一些是‘压迫’的秩序。当然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是这种作用的集中基地，但那不是解放的工具，不过我们仍可考虑——而这通常不被承认——除了排除任何抵制的凌虐与行刑外 不管是哪一个多么残酷的既定体制，都仍会存在着许多抵制、反抗以及对立集结的可能。

另一方面，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在功能上是——从其性质来看——绝对解放。自由是一种实践。因此，事实上可能一直有许

多计划 其目标是修正某些限制 去松开 甚至摧毁它们 但是从其性质来看, 这些计划没有一个能保证人们将自动地拥有自由; 保证计划自身可以建立这个自由。人类的自由从来没有被设计出来保障他们的制度 (机构) 和法律保障过。这就是为何大部分的法律和制度 机构 都可以翻转 不是由于它们暧昧 而只是因为‘自由’是必需被操作的东西。

雷比诺: 有没有关于此的都市例子, 或建筑师成功的例子?

福柯 嗯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讨论一下科比西埃 (Le Corbusier), 他今天被—— 一种在我看来毫无益处的残酷——描述成一个隐匿的斯大林主义者 (Crypto-Stalinist)。我确信他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人, 而且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也贡献出解放的功用。或许他所提出的手段 最后比他所设想的更缺乏解放性 但是再一次重申 我认为永远不会有一个人先天性的事物结构来保证自由的运作, 只有自由才能保证自由。

雷比诺: 因此你不认为科比西埃是个成功的例子, 你只是说他的意图是解放。你能否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事例?

福柯: 不! 不可能成功。假如有人, 或许一些人, 在找一个能自由有效地运作的地方,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地方与客体 (object)<sup>①</sup> 的秩序无关, 却与自由的实践有关。这不是说, 我们毕竟也可以把人们遗留在贫民窟, 想象着他们只可以在那儿运作其权力。

雷比诺: 这意思是建筑本身无法解决社会问题?

福柯: 我想它可能也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 即当建筑师的解放意图与人们运作本身自由的真实实践一致时。

指建筑物。

雷比诺：但是相同的建筑也可以服务其他目标。

福柯：完全正确。让我再举一例：古丹 (Jean-Baptiste Godin)<sup>①</sup> 在巨兹 (Guise) 地方的工业合作社 (Famillistere) (1859)。古丹的这座建筑清楚地指向人们的自由。它明示了普通工人可以参与控制他们自己的交易活动的权力。它是相当重要的工人团体自律的象征与工具。然而，没有人可以在不被其他人监视下进入或离去——这是个可能变成全然压迫的建筑角度——但是只有当人们准备以自己的出席来监视其他人们，才可能是压迫的。让我们想象有一个社区建立了没有限制的性关系，它可能再度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地方。我想这对于试图隔绝人们实际的自由实践、社会关系实践，以及找到自我的空间分布来说是一种歧见。倘若人们被隔离，他们将变得难以了解。每一方只有透过他者 (the other) 才能被了解。

雷比诺：但是人们经常试图找到乌托邦构架 (schemes) 以便自我解放或压迫他人。

福柯：人们梦想着解放机器，<sup>②</sup> 但是按照定义 并没有所谓的自由机器。这不是说自由的运作完全与空间分布无关，而空间只能在某种时势际会时作用。在分歧和扭曲的情况下，它马上会与原来的意图相反。巨兹<sup>③</sup> 的圆形监狱性质 (panoptic qualities) 同样可以完美地当作监狱来使用。没有任何事可以绝对单纯。事实上 很清楚地 这个工业合作社的空间 也可以作为涉及纪律的工具 给人一种不能忍受的团体压力。

① 法国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家傅立叶的信徒。

② 在此福柯把空间当成某种机械。

指前面提及的古丹的工业合作社。

雷比诺：因此，建筑师的意图不是什么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福柯：没有任何事是根本的。这就是社会分析的有趣之处。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比这些探究更刺激我——这些探究从定义来看是形而上的——探究着社会中权力的基础或自助制度（机构 筹 其中只有不同意图间的共生关系和永恒的鸿沟。

雷比诺：你已指出医生、囚犯、牢头、教士、法官和精神病医师是涉及支配性政治结构（*political configuration*）的主要人物。你会将建筑师放在这个名单上吗？

福柯：你知道，当我在描述医生和这一类人时，我不是试图描述支配性人物（*figures of domination*）而是在描述那些经由他们的权力得以传递，以及在权力关系领域中重要的人。一个精神机构中的病人是被安插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权力关系中的，这点戈夫曼（*Erving Goffman*）分析得很好。基督教或天主教堂（新教有些差异）中的教士，是一组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建筑师不是这种个体。总之，建筑并没有支配我的权力。假如我想拆除或改建建筑师为我设计的房子，增添新隔间、加上烟囱时，建筑师并没有控制权。因此，建筑师应被放在另一个范畴——不用说，他并不全然处在社会运作权力的组织、实施及技术之外。我会说我们必须把他——他的心智、态度——和他的设计一起考虑，以了解投入在建筑中的一些特定权力技术，但是他却不能跟医生、囚犯、精神病医师或牢头相比。

雷比诺：在建筑圈内“后现代主义”受到很大的重视。同样情形也发生在哲学领域中，令人注意的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很清楚地，历史引用与语言在现代认识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你怎么看待后现代主义，不管从建筑或它所提出的历史的、哲学的问题？

福柯：我想，有一种应该受到攻击的流行、简单之倾向：选择一个刚出现的东西作为主要敌人，好似它就是压迫的主要形式，而人们必须从其中解放自己。现在，这种简单的态度引出一串危险的后果：首先是一个找寻某种廉价仿古主义（archaism 或找寻事实上人们从未拥有过之幻想的古老享乐形式的趋势。例如，在我感兴趣的领域中，令人迷惑地看到当代的性欲特质 sexuality）如何被描述成某件绝对恐怖的事。想想，今天只有在关掉电视后，才可能做爱！而且是在一个大量制造的床上做爱！“不像在那美好的时光，当……”那么，又如何评说在那美好的时光中，人们每天工作 18 小时 而且 6 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假如他幸运地拥有一张床的话！在这个对当前及刚逝去时代的憎恶中，有一个诉诸全然神话之古代的危险倾向。其次，是一个哈贝马斯所引起的问题：倘若我们放弃康德或韦伯的理论，就有陷入非理性的危险。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但同时 我们的问题也有所不同 我认为从 18 世纪起 哲学与批判思想的中心课题一直是 目前也依然是 我希望将来也仍会停留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所使用的理性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危险与限制？我们如何作为一个理性动物存在，幸运地献身于不幸地被内在的危险所交织 crisscrossed 的理性实践之中 我们必须与这个问题保持着一个密切的关系 并在心中牢记着这是一个最重要而极度难以解决的问题。另外 假如认为理性是我们的敌人 而应该予以剔除是极端危险的看法 那么这个危险最多也只不过与认为对这个理性的批判性质疑 会让我们陷入非理性的危险相同而已 我们不应忘记——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批判理性，而是为了呈现事物是多么暧昧——种族主义就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神采活现的理性上 后来变成纳粹主义最持久、有力的成分

之一。这当然是一种非理性 但是 非理性毕竟也是一种理性的形式。这种情境在我们现实生活存在 也是我们所应该攻击的。倘若一般知识分子有什么作用 倘若批判思想本身有什么作用(更特定地说 哲学在批判思想中有什么作用的话 那就是准确地接受这种回旋 spiral) 接受这种指示我们理性的必然性、它的不可或缺性 以及它的内在危险的理性旋转门。

雷比诺：从上面的讨论看来，可以公平地说你比较不害怕历史主义与对历史话语的引用，却比较担心像哈贝马斯这种人；同时 这个问题在建筑中 以文明的危机这种说法 被现代主义的捍卫者提出来，他们争辩着：假如我们为了一个轻佻的装饰与母题 (motif) 的回归而放弃现代建筑，那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文明。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则声称历史注解本身，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并将在一个过度理性化的世界中保卫我们。

福柯：虽然可能没有真正地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想说：我们应该完全地、绝对地怀疑任何必须回复什么东西的声明。其中有一个逻辑的理由 因为事实上 并不存在什么回复 return)。历史，以及把琐碎的利益应用到历史上，的确是反对这个回复主题 (theme of return ) 的最佳捍卫。对我而言，疯狂史和监狱的研究……是用一个精确的方法完成的，因为我完全了解——事实上这激怒了許多人——我用一个人们可以批判当代的方式进行历史分析 但对他们而言 不能说“让我们回到美好的旧日 当 18 世纪的疯人们……”或“让我们回到那个监狱不是主要统治工具的时光……”不行，我们认为历史使我们免于回复的意识形态。

雷比诺：因此，把理性与历史作简单对立……然后选一边站 是件愚蠢的事……

福柯：对！嗯，总之，哈贝马斯的问题是制造了一种超越的

思考方式 (transcendental mode of thought) ，弹跳出来以对抗历史主义。我自己 实际上是更历史主义的尼采式的。我不认为有一种历史的正确使用，或历史内部的分析 intrahistoric analysis 的正确使用——顺便一提 这是相当清楚的——可准确地用于对抗这种回复的意识形态。举例来说 在欧洲，一个好的农民建筑研究 可以揭露回复到茅草顶小住宅的希望，乃是纯然的虚幻。历史保护我们免于历史主义——免于呼吁以过去的方法来解决今日问题的历史主义。

雷比诺：这也提醒我们，总是有一个历史存在，提醒我们那些现代主义者想压制任何对过去历史的参考是一件错事。

福柯：当然！

雷比诺：你的后两本书处理希腊和早期基督教时代的性欲特质。在你讨论的课题中，有没有任何特殊的建筑向度？

福柯 我没有发现 绝对没有。但是有趣的是 事实上 在罗马帝国时期有一些妓院、享乐区、罪犯区等 并且有一些准公共的享乐场所 浴场、矿泉浴室 (thermes) 浴场曾是欧洲最重要的享乐及碰面场所 却已逐渐消失。中世纪时 浴场仍是男人与女人 同时也是男人与男人，以及女人与女人碰面的场所，虽然甚少有人提及。被提到而且咒骂的 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碰面 这在 16、17 世纪期间消失了。

我们可以在《天国的婴儿》( *Les Enfants du Paradis* ) 中看到 此书忠于历史。其角色之一，拉仙尼黑 (Lacenaire)—— 没有人提及——是个贱人和淫媒，用男童去引诱老头而后勒索他们；其中有一幕就提到这些，对此需要所有超现实主义的天真及反同性恋，才会忽视那个事实。因此，浴场作为性碰面的场所继续存在。浴场是城市中心的一种享乐大教堂，人们可以随他们意愿而来此

闲逛、彼此挑选、碰面、作乐、吃喝、讨论……

雷比诺：因此，性与其他享乐分不开。它深植于市中心，是公共的，为某个目的服务……

福柯：不错！对希腊人和罗马人言，性欲特质明显地被当作一个社会享乐。今天男同性恋最有趣的是——这对女同性恋者言已存在多时——性关系立即转变成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则被当成性关系。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则有不同方式，性关系有一个最宽松的意义，被安插在社会关系中。浴场是一个社会场所，包容了性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地比较浴场和妓院，妓院事实上是一个享乐的地点及建筑。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形式，亚兰·戈宾(Alain Corbin)在他的《婚礼的少女》(*Les Filles de Noces*) (欧必叶, Aubier 1978) 中研究过。城市中的男人在妓院中碰面；他们因为同一个女人在他们手中流转而彼此关连，相同的疾病与传染病也在他们身上流通。妓院中存在着社会性(sociality) 但是古代浴场的社会性——一个新版本可能再次存在——与妓院的社会性是完全不同的。

雷比诺：我们今天知道许多有关纪律的建筑的事。不过与忏悔(confession) 有关的建筑——一个与忏悔的技术可能有关的建筑——又如何呢？

福柯：你是说宗教建筑？我想它曾被研究过，修道院作为仇视陌生人的 xenophobic 空间有许多问题。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对共同生活的准确节制，作用于睡眠、进食、祷告，以及所有小房间中全部个体的场所。所有这些在很古早就已安排好了。

雷比诺：在权力技术中，忏悔相对于纪律、空间好似也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

福柯：对。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

权力运作的基础。作个插话式的注解 我想起 1966 年被一群建筑师邀请去做一个空间研究，研究我当时称为“差异地点”(heterotopia)的东西，那些独特的空间可以在某些社会空间中发现，它们的功能如此不同 甚至彼此相反。那些建筑师研究这个题目 最后 有人说话了——一个萨特式的心理学家——他用‘燃烧弹’袭击我，说空间是反动的(reactionary)与资本主义的 但历史与流变(becoming)是革命的。这种咒骂的论述，在当时并非反常。今天大家可能会对这样的声明哄堂大笑，但当时不会。

雷比诺：特别是建筑师，倘若他们选择分析机构性的建筑，如医院、学校 提供有关纪律的功能 可能会特别注意墙面。因为那是他们设计之所在。你的取向可能更注意墙壁间的空间，而非建筑，那仅是机构中的一种面相。你如何分别建筑物本身和空间这两种取向之间的差别呢？

福柯：我想其中在方法上与取向上有一个差别。这对我而言是真实存在的，建筑在我作过的粗俗分析中，仅被当成一个支持元素，以保证人们在空间中特定的定位、移动的渠道化(canalization) 以及符号化他们的共生关系。因此 它不只被当成空间中的一个元素，而且特别被当成一个社会关系领域中的安插，而带来了特殊的效果。

举例来说，我知道有一个历史学家，他正在进行中世纪的考古研究，他研究的是建筑问题，中世纪住宅的烟囱问题。我想他正在呈现着从某一刻起，在住宅内部建造烟囱 [ 一个有炉床(hearth) 的烟囱 ] 可能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个敞开的房间 或室外的烟囱 并显示在那一刻 各种事物都发生着变化 而且使不同个体间的差别变成可能。这些在我看来都很有趣，但是他在论文中所提出的结论竟是：意念和思想的历史没什么用。事实上，有趣的

是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人们为何努力摸索屋内盖烟囱的方法呢？或者为何他们如此使用他们的技术？在技术史上，这通常需要很多年，甚至整个世纪来完成。可以确定的，而且非常重要是，这种技术对新人类关系有一个构成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将之想成：人类关系的演变与策略，不在这个发展与调适的方向中起作用。真正有趣的是交互的关系，而不是一方支配另一方，这种看法从来没有意义。

雷比诺在《事物的秩序》<sup>①</sup> (*Les Mots et Les Choses*) 中，你建构了某些生动的空间隐喻以描述思想的结构。你为什么认为空间意象可唤起这些隐喻？这种空间隐喻对纪律的描述与对机构空间的具体描述会发生怎样的联系？

福柯可能由于我对空间问题感兴趣我在《事物的秩序》中使用了許多空间隐喻，但是这些隐喻却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17世纪认识论的变化与转变，令人惊讶地看到：知识的空间化是把当时的知识建构成科学的因素之一。假如自然历史与林奈 *Linnaeus* 的分类法是可行的，那么会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他们所分析的对象的空间化，因为他们在一个可见的基础上，给出自己所研究与分类的植物的规则。他们甚至不想使用显微镜。所有传统的知识元素，如植物的医药功能，都褪去了，研究对象被空间化了。其次，空间化更进一步，因为分类的原则必须在植物的结构中找寻元素数量、其排列、大小等以及其他特定元素，如植物高度。再次，书中图片的空间化，这是由于特定的印刷术才变成可能。随之，植物复制本身也被空间化，表现在书中。这些都是空间技术，而不是隐喻。

此书译名以英文本书名为之。

雷比诺：建筑物的实际平面——变成墙和门的精确图绘——是否类似于话语的形式 比如说，一个不只是在空间 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描述人们较准确关系的多层次的金字塔？

福柯 嗯 我想有几个简单而特别的例子 显示了建筑的工具复制了 其中将有或多或少的权重 社会的等级。有一个军营模型 其中军事等级可从配置本身读出来 那就是为不同阶级保留的帐篷和建筑物所占有的位置。建筑准确地再造了一个权力金字塔 不过这是一个社会中特权的特例 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军事化的——并且是一个极端简单的案例。

雷比诺：但是平面本身并非总是不同关系和权力的一个清单 (account)。

福柯 幸亏有人类的想象力 事物总是更为复杂些。

雷比诺：建筑当然不是恒常不变的：它有一个很长的成见、体系和规则变迁的传统。建筑的知识 (savoir) 部分属于专业的历史 部分属于营造科学的演化 部分属于美学理论的重写。你对知识形式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建筑知识比较像科学呢 或比较像你所谓的“暧昧科学”(dubious science)?

福柯 我不能精准地说 确定与不确定的科学间的差异是无趣的——这是逃避问题——但我必须说 让我感兴趣的集中在希腊人称为“techné”(工艺)的部分，亦即被意识目标控制的实践理性。我甚至不确定是否值得一再询问：统治能否成为精准科学 (exact science) 的目标这样一个问题。另一方面 假如建筑 像统治实践和其他社会组织实践一般 被当成工艺 它可能使用了物理学、统计学等科学元素 这是有趣的部分。但是 假如有人想研究建筑史，我想这应该比较接近一般工艺史的路径 (a general history of techné)，而比较不是精准科学或非精准科学的历史。

“teche”工艺 这字的缺点是它与“ technology” 技术 的关系 后者有一种特定意义。“技术”一词被赋予非常狭隘的意义：人们想到了纯技术 木、火、电的技术。其实 统治也与技术有关 对人的统治、对精神 soul 的统治、对自我的统治、对家庭的统治 对小孩的统治等。我想一旦我们把建筑史放回广义的一般工艺史（译注 即包括统治）我们可能得到一个比只考虑精准科学与非精准科学之间的对立更有趣的指导概念。

（陈志梧 译）